

《越南的文化與社會》專號 編序

許文堂*

一、越南專號緣起

本期越南專號名為《越南的文化與社會》，緣於 2013 年 9 月 27 日，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轄下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東亞研究群所共同舉辦的「越南的文化、經濟與社會」研討會議，此次研討會議承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前任執行長林正義研究員與朱德蘭研究員大力支持，以及現任執行長蔡明璋研究員鼓勵出版，特此感謝。

「越南」一直是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長期關注的研究地區，從早期的華人、宗教、歷史、中越關係、建築史等在地議題，拓展到臺越經貿、移工、新移民等雙邊發展。這樣的研究趨勢顯示了越南研究除了在原先的議題進一步的深化，也嘗試對越南革新政策後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提出解釋。這一研究旨趣不是對既有研究的捨棄，反而是一種延伸，也是「臺灣的東南亞研究」學術社群一路走來所秉持的研究精神。

當然「文化」的概念十分複雜，且與「社會」一詞同樣地傾向抽象的表述；但文化與社會議題卻一直以來都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關注焦點和研究興趣所在。越南研究，在我們看來是必須以越南作為主體的學術研究；社會是指人類的集體生活，而文化則是來自人類集體生活的創作。「越南的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的旨趣，即在探討以越南文化或越南人為特徵的研究議題和現象，其中包含了歷史、宗教、語言、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等，甚至是跨越學科的考察與辯證。與會者皆是以長期關注越南議題的學者為主，此次選輯四篇研究成果，可以凸顯越南研究議題的多元化與發展性。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各篇特色

本刊第一篇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許文堂所撰〈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北越華人社會之變貌〉，許氏長期關注越南華人和宗教議題，本文認為，越北或全越華人人口成長率之劇烈變化，不能排除與華族同儂族、艾族、山由等文化相通族裔之邊界流動有關。華人族裔性之固執反映在其文化邊界之嚴實，不輕易與越族或他族通婚的歷史經驗足以說明此種固執，因此若有華人捐棄其華人族裔身分，則必有現實考量與不可抗力左右。而越南長年不利於華人的政治氛圍正是主因，越南華人不只遊走於國家間的邊界，亦可能遊走於民族間的邊界。

第二篇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張書銘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龔宜君所合著的〈社會鑲嵌與文化收編：越南農村基層的政治運作邏輯〉一文，兩位作者數次前往越南進行田野研究，對越南基層政治的觀察感受到一種隱晦而有秩序的運作。該文從農村基層的政治運作進行觀察，這也是文章的特別之處，有別於目前討論越南中央政治體制的文獻探討。作者們認為除了從中央到地方由上而下（中央、省、縣、社、村）的政治系統運作原則之外，基層的「文化中心」不僅是集會和言論自由的象徵，也是越南共產黨習以文化之名隱身於農村日常生活之中，進而實踐其意識型態的場所。而農村基層的政治實作，仍必須仰賴地方幹部綿密而複雜的人際和職務關係（社會資本）。簡言之，黨和國家的基層治理，除了政治系統的運作原則之外，也必須藉由文化中心和幹部的多重意涵與身份才得以遂行。

第三篇為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講師兼越南研究中心主任阮氏美香所撰〈中越語翻譯差異呈現〉一文，該文以語言與思維為主線，著重論述中越語言之間互動。通過深刻分析語言中隱含的人文特徵，縱觀民族文化傳統，突出「語言—社會—文化」間的互動，探討語言結構、文化背景和思維模式之間的密切關係，比較中越二國的語言與文化在交際語中的異同。作者認為一種語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會產生其所特有的詞彙，而這些詞彙在另一種語言中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能直接用單純的翻譯替代的。語言是沒有界定誰是誰非的問題，從訊息傳遞者的角色任務而言，譯者必須專業地呈現翻譯的內容給大家，所以不單純只要語言好就好，譯者需要瞭解兩國文化、各領域專業用詞，才能成功的轉換

與表達。

第四篇為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通識教育學科兼任助理教授李貴民所撰〈越南阮朝明命時期（1820-1841）海防體系的改革與運作〉一文，作者認為越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阮朝，因曾遭受西方的殖民統治，在越南民族獨立建國時候，遂成為共產越南批判的對象，當然就無法對於阮朝歷代的皇帝有比較客觀的描述。然綜觀阮朝統治的皇帝，依照傳統朝代的標準來做評價，其實從開國初的嘉隆帝到嗣德帝皆可堪稱明君，尤其是第二代皇帝明命帝。明命帝在位時積極建設海軍，除了增建船艦、改良戰艦，對於海軍人員的素質、訓練都加以提昇。沿海也建立巡防、通信體系，加上沿海砲臺的設立，基本上形成立體空間的海防體系，亦可以有效監控外國船艦在越南沿海的動態。

上述四篇文章研究學門橫跨歷史、社會、和語言等學科，議題涵蓋華人群族、政治社會、語言文化、軍事歷史等領域，呈現作者努力撰寫並歷經審查人提供修正意見的研究成果。越南研究在臺灣學界實為小眾，希望透過這次專號的出版，進一步累積越南研究的既有議題與多元發展。